

春晚,为什么不“可乐”了?

■本报见习记者 韩天琪

编者按:

当下,中国人最关注的热点之一是即将登场的冯氏春晚。冯小刚擅长贺岁喜剧片,央视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希望通过他的匠心,使春晚能够带给人们更多的笑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今天,给人们带来笑声越来越难了。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到底需要怎样的娱乐?围绕这个话题,我们约请了相关专家从思想层面各抒己见。

春晚作为中国人除夕夜一道重要的“年夜饭”,也跟着时代的巨变,从 30 年前的过年大联欢到如今的“各家论长短”。近些年,大家普遍的感觉是“春晚越来越难以逗乐中国人”了。而冯小刚擅长的贺岁喜剧片虽然幽默方式经年不变,却依然能逗笑对娱乐电影阈值逐渐升高的国人。冯氏幽默与央视春晚的相遇会带来怎样的化学反应?春晚,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还能唤起中国人共同的欢笑吗?

曾经的全民娱乐盛宴

春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全民娱乐盛宴。每到除夕,几乎家家户户的中国人都等候在电视机旁,等待春晚带给自己的愉快享受。在如今娱乐方式如此多元的中国,能号召全国乃至世界华人共同关注的全民娱乐可能也就只此一处了。

经历过 1983 年第一届春晚的中国人,肯定难以忘记李谷一一人独唱 8 首歌的场景,那是长期的文化压抑后一场酣畅淋漓的宣泄。现在的新生一代,恐怕很难理解在那样一个开放初期的环境中,春晚寄托着中国人怎样的希冀和情怀。30 年前,正是春晚的相声、小品,开启了人们可以放下包袱、开怀大笑的时代。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养成了看春晚过除夕的习惯,只因为春晚能在阖家团圆的时刻带给人们欢笑。

然而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近年来,春晚的吸引力却在逐年下降,春晚能带给人们的欢笑越来越少。人人都失望,春晚的小品、相声既不

可笑,又无讽刺。春晚成为了除夕餐桌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道“鸡肋”。

这当然与春晚本身的定位息息相关。“30 年前,春晚只是一个全民大联欢,电视台举办这样一场晚会,大家高高兴兴过年就好。而随着时间的变化,春晚被赋予了越来越多其他的功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上世纪 90 年代,央视转型成为真正的国家电视台。主流意识与政治期望,开始前所未有地注入春晚这台文艺晚会。春晚被赋予了太多的东西。今天的春晚并非一台纯粹的娱乐晚会,它是娱乐的,也是文化的,还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

相比上世纪 80 年代初,今天的受众有了更加多元的娱乐选择和娱乐品位。而社会的巨变实际上带来了社会阶层的高度分化和利益关切的高度多元。春晚无法毫无顾忌地用讽刺来幽默,因为高度碎片化的社会需要调和更多的口味。

30 年,春晚背上了更多一致性的符号,而它的受众,却向着相反的方向聚集。

冯氏春晚会好吗

一份来自媒体的调查数据显示:72.4%的人希望春晚节目有所改变和创新。可对于这台无法避免“高大全”的晚会,创新难免流于技术和形式,广阔观众群的众口难调成了春晚之“困”。而今年,这个困局交到了以“贺岁喜剧”而驰骋中国电影界的导演冯小刚手中。

一个是亟须创新的传统综艺节目,一个是擅长幽默的老牌电影导演,冯小刚和春晚的结合会带来怎样的亮点?

冯小刚的所有声名与自信,建立在旁人难以企及的电影票房上。而冯氏电影的高票房,是建立在群众的喜闻乐见和国产优质电影奇缺的基础上。将“冯氏幽默”运用到观众已经“审美疲劳”的春晚上,还能起到和电影一样好的效果吗?

除了载体的变化,央视春晚的严格审查也对“冯氏幽默”能抖出多少包袱有一定影响。春晚和冯导都有自己固定的路数,有媒体曾这样评论:“马年春晚是冯小刚玩得最大、也最拧巴的一票贺岁片。”

然而,就在这些看似不一定和谐相融的因素中,仍然有冯氏春晚值得期待的理由。纵观冯小刚历年的贺岁电影,“成全别人,恶心自己”是其惯用的幽默手法。在政治正确、面面俱到的要求下,毫无顾忌的讽刺失去了可能性,在谁都不能讽刺的前提下制造幽默效果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嘲”,而一众冯氏影片演员的加入,因其体制外的身份属性,反而为这种“自嘲”增加了张力。我们有理由期待,冯小刚在马年的除夕夜,会带来一台“成全观众,恶心自己”的冯氏春晚。

艰难的平衡

1983 年第一届春晚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吃鸡》和 1984 年春晚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任何宏大的

意义,只是遵循幽默的规律,用夸张的肢体动作,误会、贪心等,让人们哄堂大笑。对于后来的春晚来说,没有宏大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它所承担的是照顾社会方方面面,让社会各阶层满意,完成政治功能、社会风俗的表达功能,每年的总结功能、正面宣传的功能等等。今天的时代已经与 30 年前很不一样了,还想看到跟以前一样的春晚是不太可能的。”尹鸿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今天,人们可以看到相声、小品、喜剧电影、情景喜剧,专业的文工团、说唱团都有制造笑声的人,网络上还有专门的笑话、幽默段子写手,可是我们所需要的欢笑,在数量上总是供不应求,在质量上总是不如人意。

在段子领域耕耘多年的东东枪说过:“毫无顾忌是幽默的开始。”“可乐”来自于讽刺和幽默。而讽刺和幽默需要环境,同时又最不愿意受到环境的限制。但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阶层高度分化,利益诉求高度多元的碎片化社会。任何一点讽刺,一旦放大到春晚的舞台上,都有可能引发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嫌隙。

2011 年春晚语言类作品总导演马东曾经说过,“欢乐祥和别添堵”是春晚的基调,可这基调生生挤掉了“可乐”,“一说讽刺,一说现实,就看成是添堵,这是狭隘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幽默并不应该以讽刺当下为己任,离时代太近的幽默,也容易被时代抛弃。

春晚艰难地在不同的诉求之间把握平衡,它已经背负了太多标签。也许正因为如此,春晚离它的初衷越来越远?

期待看到“冯氏幽默”

《中国科学报》:您对于“春晚现象”的看法是什么?

杨早:“春晚现象”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春晚本身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其地位和功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今天的春晚相比于 30 多年前的春晚,其负载的意义加大了。

另外,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利益多元化都比较严重,再想寻找到全社会众口一词想要批判或欣赏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其实春晚在近些年一直饱受诟病,比如语言类节目对农民的不友好嘲讽,对广东人、上海人等的地域歧视。这就使得春晚在面对这种社会分层和冲突时,更加小心谨慎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

但如果一台娱乐性的晚会需要保持这种“政治正确”的话,讽刺就变得非常危险。不光是官方的东西不能讽刺,其实各个阶层都不能被讽刺。一个节目被赋予的地位越高,它就越难找到讽刺的动力和胆量。也许郭德纲的相声在小剧场演出的时候顾忌较少,但在春晚的舞台上,他必然要磨去一些棱角。一台晚会一旦被定义为一个“庆典”,就意味着它不太可能有过于尖锐的表达。这是春晚本身定位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春晚语言类节目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敢于讽刺了,对此您怎么看?

杨早:我认为,没有必要要求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针砭时弊。反映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不是春晚必须承担的一个功能。30 年前,我国的舆论渠道是比较少的,春晚作为一个举国观看的节目,但又不像新闻联播那么严肃,出现一些针砭时弊的小品、相声,会让老百姓觉得很过瘾。但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春晚的小品已经达不到这种程度了。这就好像在上世纪 80 年代,文学承担了很多批判社会的功能,而现在,大家已经不把批判社会的功能完



杨早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全加诸小说之上了。随着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这种途径已经发生了转换。

《中国科学报》:您对今年的春晚有什么期待?

杨早:春晚的内收性是没有办法的,它必须考虑到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而严格的审查制度保证了这种内收性。这与当前中国电影的处理十分相似,从这个角度来说,冯小刚作为电影导演执掌春晚,他面对的审查环境是一样的。

在谁都不能讽刺的前提下制造幽默效果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嘲”。其实这从前两年的春晚已经初露端倪了,比如主持人之间互相开对方的玩笑来制造所谓的效果。但这种效果并不十分好,因为主持人本身缺乏一种自我抽离感。我想冯小刚执导的春晚可能会更多地在这方面下功夫,非央视出身的张国立在“自嘲”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张力,所谓的“张力”是说我怕被嘲笑,嘲笑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主持人都来自一个单位,受一种力量管辖的话,可能的玩笑就开不起来了。冯小刚怎样将“成全别人,恶心自己”的冯氏幽默带进春晚是我比较期待看到的。

中国人需要多样化的娱乐

《中国科学报》:人们为什么普遍比较怀念早期的春晚?

陈旭光:上世纪 80 年代初,刚刚从“文革”时期走出来,被长期禁锢的人们初次接触春晚,一下子被它的别开生面和新鲜感吸引了,春晚的“温情”“亲情”是与“文革”的“革命文化”完全不同的。春晚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全国人民每年都期待的情感“大餐”。另外,上世纪 80 年代的春晚有一个特点,即内容为王、形式简单、投资不大、广告不多,而作品内容真正地接地气,相较于目前春晚的状况,确实让人倍加怀念。

《中国科学报》:人们总觉得近年来的春晚不尽如人意,原因是什么?

陈旭光: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应用,春晚的场面越来越大,投资逐年增高,难免形式大于内容;进入多媒体、自媒体时代,娱乐方式多元化,一台春晚无法承载更多层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春晚越来越难办,骂声越来越多,这是正常的。

春晚被赋予了太多国家意志,“欢乐”“祥和”“奋进”“和谐”的基本主题几年来一以贯之。而现在的网络电影、网络剧等娱乐形式不乏无厘头、轻松的元素,这让年轻人更多地选择后者,所以,对他们来说,春晚的吸引力的确不是特别大。

即便如此,长期以来,春晚已成为新的民俗,也成为一种贺岁文化,大部分老百姓还是在每年的这个时段有所期盼,就像团圆饭一样不可少。现在春晚碰到的困难是,它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春晚也在不断摸索,今年请冯小刚做总导演就是一个探索。冯小刚是在戴着脚镣跳舞啊!冯小刚以贺岁片在老百姓心目中建立起的冯氏幽默风格,以及反映主旋律的《唐山大地震》《集结号》等,让大家对他抱有期待,希望他为今年春晚增加一些幽默、欢快的平民化元素。

《中国科学报》:您对春晚的期待是什么?

陈旭光:我认为,春晚不要一味地板着脸孔,要真正欢快、真正地平民化、真正地时尚化,设计出各个文化层次、社会阶层都能接受的节目。

近年,春晚已经是国家形象的象征,被赋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种功能不宜太强烈,否则就“太高”“太大”“太严肃”,就会淡化它的平民气质、民生性。

当今的文艺娱乐是不断走向平民化的时代,所以春晚也要关注平民,真正为老百姓着想,要更接地气。虽然做起来很难。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娱乐?

陈旭光:我认为中国人需要多样化的娱乐,不要太板着脸孔,道德标准不要太严。因为中国人对娱乐的欣赏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文化认同的人有不同的娱乐取向。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个观念,即“娱乐无大害”——有些娱乐可能是粗俗的、无厘头的、不那么高雅的,但是它在伦理上没有大害。



陈旭光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春晚如同除夕夜的饺子

《中国科学报》:对于冯小刚导演春晚,您曾评价为“有勇气”,为什么这么说?

尹鸿:过去这些年,春晚年年都在讲创新,年年都在集思广益,年年都动用了很多社会资源,但所有的创新都仅仅局限于形式、手段、技巧,它内在的体系是非常坚实的,很难改动。

我认为冯小刚担任今年春晚的导演,并不会使春晚有多大的改变。春晚要面对的不仅是严格的审查制度,它的功能、体制、特殊的平台,当然也包括审查,所有的这些都是有形或无形的巨大体系,任何人想改动它都非常困难。

《中国科学报》:近年的春晚与最早的春晚相比有什么变化?

尹鸿:与 30 年前相比,现在的春晚被负载了越来越多的功能。特别是在年关这样一个对于中国人有特殊意义的时间,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代表国家主流声音的媒体,在这样一个承担着大众欢乐的除夕的平台。从性质来讲,它变得越来越形式感,越来越庄重,越来越难容下一些尖锐的东西,而差异性的表达也会变得比较困难。

这样一个定位的春晚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所以现在的春晚很难像当年那样可以容纳一些尖锐、有力量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个欢庆仪式。如果用改革开放早期人们对文化生活的期待来判断现在的春晚,就已经发生错位了。

过去的春晚就是中国一年当中最优秀节目的集大成,有一点过年的喜庆气氛就可以了,没有后来很多功能的复合,再加上当时的社会状态比较开放,思想也比较活跃,也没有那么多的利益群体从不同角度要求春晚。而现在春晚必须照顾社会方方面面,让社会各阶层满意,完成政治、社会的表达功能,每年的总结功能,正面宣传的功能等等。

近年来的春晚,一方面,内容变得越来越板块化、形式化、仪式化,实质性的内容在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春晚的受众也确实发生改变,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娱乐需求、价值观和判断标准,而受众娱乐生活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化。在我国目前社会阶层迅速分化,利益多元化的现状下,春晚要照顾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确实非常困难。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娱乐?

尹鸿:现在的中国人需要多元化的娱乐选择,在当今中国,多元化的娱乐选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需求,而更多的是一个事实。其实春晚之所以成为一个现象,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很难找到一个全社会都关注的共同话题,大家都拿春晚来做一个共同话题。春晚就像我们年夜饭中的饺子,30 年前,饺子是过年才能吃到的大餐,而现在,饺子更多地成为了除夕夜的一个仪式。如果我们把看春晚当作是除夕的饺子一样,就不需要让它负载那么多的压力,大家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欢度佳节。

马年春晚:熟悉的陌生人

《中国科学报》:您对今年的春晚有什么预测?

刘悦笛:对广大的中国受众来说,马年春晚大概会是“略显陌生的熟人”吧!说它熟悉,那是说它不会超出春晚传统的整体范式,如果变得太过、太多、太深都会使之陌生化。诚如马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所言:“我对春晚的改变,远不如春晚对我的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春晚不是电影,不是“导演的艺术”,而是顺应大众、多元综合的“总体艺术”。

马年春晚要成功,就要做“熟悉的陌生人”。说它陌生,就是说冯小刚导演还会加入诸多新要素:冯氏幽默那种“北方喜剧式”的语言艺术会强化,歌舞节目会更加接地气,青年化的走向也会更凸显,高科技布景则会淡化。但这些改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突破既定的审美定式,就要看这套饕餮大餐如何烹任了,导演春晚就是一种把握“度”的手艺。

总之,春晚更像是一道名菜“乱炖”,既是喜闻乐见的冷菜热烹,又要把天南地北各色口味调和在一起。如能达及古人所讲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那便是极高明的境界了!

《中国科学报》:人们对近年来的春晚不满意,原因是什么?

刘悦笛:答案很简单——大众感到“审美疲劳”了。一方面,接受美学在提升,上世纪 80 年代民众审美期待并不高,90 年代后才逐渐增强并累积至今,对春晚要求再高也不为过,但单一的春晚怎能满足多元的文化?另一方面,创作水准却相对滞后,相声与小品的高峰期相继而过,歌舞亦难有新意推出,倒是举国欢庆的内在政治诉求未变,也许马年春晚会更让中国民众纯粹“图个乐儿”?冯氏春晚的变局,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娱乐?

刘悦笛:当然需要“多元共生”的娱乐了,无论就直面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言,还是就差异的文化内容来说,雅俗共赏、半俗半雅、大俗大雅其实都需要。春晚的观众一定会逐年递减,因为青年文化群体成长起来后,自有高媒介与自媒体的文化需求,春晚迟早会成为老年人温馨的“文化记忆”。文化的后浪推前浪,“道是无晴却有晴”!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中国人娱乐生活的现状如何?

刘悦笛:我觉得差强人意。我正生活在纽约,听到海外媒体对于崔健退出春晚的评价说,面对当今精神的荒芜,是不是仍有“一无所有”之感?过去我们物质贫乏,但精神丰富;现在我们物质丰腴,但精神骨感!尽管文化大众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但文化大众化并不等于低俗化。当今中国亟待在提升美育基础上,打造出属于本土的“大众生活美学”,由此,蔡元培先生所力倡的“美育代宗教”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王剑 韩天琪采访)



尹鸿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